

文化中国
天地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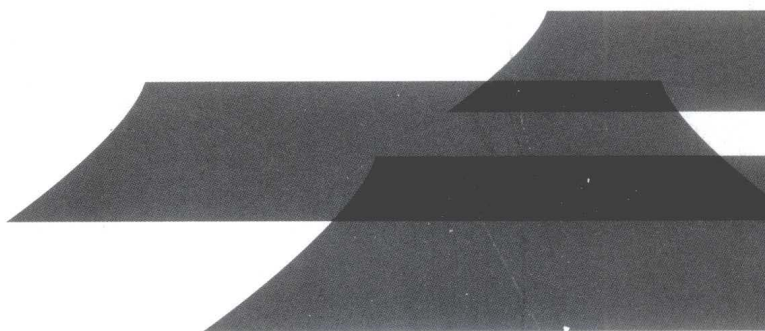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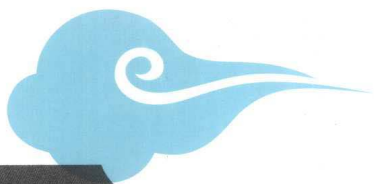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制度略论

随着周代宗族封建制下贵族政治
的崩溃，相继发生的是官僚政治
的萌芽、茁长……

郑钦仁

主编



黄山书社

中国古代制度略论

主 编 | 郑钦仁

本书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授权出版发行简体字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制度略论 / 郑钦仁主编.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11 (文化中国丛书)
ISBN 978-7-5461-2266-3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5839 号

中国古代制度略论

郑钦仁 主编

出版人: 左克诚

责任编辑: 孙晓林 李钰洁

责任印制: 李磊 赵彬

装帧设计: 范晔文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邮编: 230071

策划: 香港三联书店北京工作室

发行: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电话: 010-6551362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 010-61202350

开本: 710×1050 1/16 印张: 20.5 字数: 263 千字

版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2266-3 定价: 42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林载爵

这一套“文化中国”丛书原来是以“中国文化新论”之名，于1982年10月在台湾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总共12册，将近4000页，约400万字。这套丛书讨论了10个主题，包括：文明的根源、思想、文学、科技、制度、经济、学术、社会、艺术、宗教礼俗。以118个题目全面性的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各个层面，组合成一幅比较完整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图像。撰写者一共96位，网罗了当时年龄约30到40岁的青年学者，反映了1970年代以来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的反省与思考，构成了中国文化再诠释的新篇章。这些学者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几乎都位居台湾学术界与文化界的重要位置，当年所发表的论点今天仍然具有新意，可以提供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视角。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在受到西方文化长期的冲击以及连带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之后，好不容易终于体认到传统与现代是连续性的整体，不可分割断绝。因此，一部超越传统的论述，适合于当时处境与需要，又有系统的中国文化史论著，显得十分迫切。其次，中国文化在1970年代的华人世界需要重新被检视，而台湾则是一个恰当的

地方。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在大学又接受了西方式的学术训练，西方汉学家或台湾出身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历史学者，不断在台湾传播新的观念与思维，他们给台湾学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到1970年代，这样一批受到西方式现代教育熏陶，对传统中国文化又有新见解的年轻学者已经在台湾出现，成为台湾学术界的一股新兴力量，他们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自然有着不同的视野与不同的解释。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将他们集合起来，总体呈现一个全然有别于过去的中国文化的新观点与新解释。

于是，《联合报》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以他所设立的“文化基金会”资助了这个庞大的出版计划，目的就是要“提供一部丰富新颖、流畅可读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撰述者之所以以年轻一代的学者为主，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呈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三十年台湾文史教育的成果，并且深信年轻一代学者以其所吸收的西方知识、所接受的近代治学方法训练，必能对传统文化提出新的解释观点。

从历史背景来看，1975年是台湾思想发展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林毓生教授首度返台任教，开启了一批想要获得更精密的思想方式的青年学生的视野。他在这一年的5月发表了一篇长文：《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点燃了沉闷气氛下青年学生重探狂飙年代的兴趣，与领会思想问题的不同讨论方式。同年年底，余英时教授发表了《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文章中深入而前所未见的观点，让青年学生发现思想的新世界，这个世界辽阔无边，只要运用理智的思考与分析，加上一些想象力，便可展翅飞翔，一股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开始出现。

隔年，1976年，余英时在《联合报》副刊上陆续发表《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术发微》等文，为当时争论不休的“专制”问题提出了中肯而又有说服力的解释。9月，余英时将上述文章及其他论著结集为《历史与思想》，由联经出版，这是余英时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

不论林毓生或余英时，在讨论问题时都不时引用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对台湾青年学生带来极大的刺激。此后，翻译现代思想名著成为几家出版社的共同职志，知识青年在这方面所表现的求智渴望，是1970年代末期台湾文化界极为突出的现象，这是一个思想燃烧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知识青年一方面向西方看，一方面又回望中国传统文化，企图让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受到批判之后赋予新的解释，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中国文化新论”就是这个组合的产物。

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也有其新颖之处。一般丛书的编撰，惯例上都是汇集单篇论文而成，这一次突破了旧有的方法，从开始就采取了以研究讨论为基础的共同参与方式。自丛书的主题、篇目，各篇间的相互关联，以至各篇文章的论旨，都经过每册作者讨论后才决定。初稿完成时，也经过切磋、问难，然后，再次修改定稿。所以，这套丛书并非过去旧有形式的论文集，而是具有主题、结构的集体创作。

有关文化史的研究，不论通史式的概述或断代式的专论，都不可避免的有其缺失。概述易省略其深奥与意涵，专论易疏忽其源流与发展。这套丛书则采取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完全根据问题的性质，或通贯而观，或断代而论。这种研究方式，保留了方法上的极大弹性，同时，也更容易彰显问题本身的性质，提出更周全的解释。以关于文学的两册为例，一册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间情爱的关注、幻想与神话，到智与美的融合，一共设计了六项我们认为能够充分表征中国文学传统的主题，给予系统性的解说，并讨论了文学的形式与意义、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另一册则分别就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宋诗、咏怀、咏物、小说、戏剧等重要的文学类别加以论述。两者配合，相信不但突破了旧有的文学史形式，而且更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内容。有关学术的一册，问题的选定则侧重每个时期的不同成就，从学术的萌芽到经学、注疏、理学、考据学，一一论列，以见学术的发展。关于制度与艺术的卷册则又注重各个不同的部分或类别。制度的一册里讨论了皇帝、宰相、监察、选举、考试、史官、地方行政、君主教育等官僚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并申述中国政治

制度的特色与历代政治改革的理想。关于艺术一册的内容包括了美学思想、青铜、玉器、陶瓷、雕塑、书法、绘画、文人生活工艺品、建筑等重要部分。

这套丛书既然是以问题为主的研究，自然而然，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一则反映了年轻一代学者的主要关心所在，一则想透过新问题表达新的解释观点。以关于思想的两册为例，讨论了忠、孝、仁、礼、公、私、仕、隐、常、变等传统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并作了新的阐释；同时也提出了理想人格、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德治与法治、儒家政治理想、法理依据、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均富理想、管制与放任、道德自主与社会约束、道德与政治、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自然观念等新问题，赋予传统思想新的意义。借着尝试提出新解释，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更能显现出来。

然而，新的解释观点并非凭空杜撰而来，在这一点上，这套丛书特别强调广泛利用前辈学者的杰出研究成果，以此为根基，再作进一步的发挥。因此，钱穆、萧公权、李济、徐复观、牟宗三、杨联陞、屈万里、全汉昇、刘若愚、陈世骧、李剑农、赵冈、劳榦、张光直、余英时等等许多前辈学者的优异著作，都随时被年轻一代的学者所征引。这种现象除了说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年轻一代学者的绝对肯定与尊敬外，更表示了处于变动之中的中国近代学术生命，在台湾的一脉相传，其意义自是无限深远。

尽管当时两岸隔绝，但各篇文章中，凡是论及根源，都运用了最新的地下考古材料来印证解说，根据最新的地下出土文物，分别从居址、器物、食粮、国家等方面，完整而清晰地描绘了八千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我们对先民活动起居的情形、食米（小米、稻米）吃肉（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的文明、上古社会形态的变迁、国家组织的出现，也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特别是提出“满天星斗”的上古文明的多元发展史观，更是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样性的了解。其他诸如讨论到地理环境、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人文思想、天下观念等问题的文章，也都能参证地下材料。

这套丛书自始即希望能涵盖较为广阔的文化活动层面。不可否认，近代历史教育过于偏重政治史，这使得历史教育的文化内涵，显得极其贫乏。这套丛书除了具备广为熟知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制度之外，更包含了以往较受忽视的社会、经济、科技、宗教、礼俗等层面。过去，对于中国科技史的了解，总是借助于英国李约瑟或日本薮内清的著作，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本与科技有关的专著，这也代表着年轻一代的科技史研究者踏出了一大步。在台湾，经济史是当时的一门新兴学问，年轻一代投入这项研究工作的，愈来愈多，相关经济的这本便是这些研究者所展现的成绩，分别从农业的自然环境、农业水利、新耕地的开发、土地分配、生产技术、商业、城市、货币信用、交通、海外贸易、财政税务等十一个方面，建构一部经济发展史。关于传统宗教，也选择了几个重要的问题来讨论。特别要一提的是风尚礼俗。近代以来，在对传统进行批判时，礼俗必定首当其冲，自命新派者，即清末所谓的“文明人”，弃之如敝履。然而，这套丛书中关于礼俗的则本着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探讨了祭祀之仪、婚丧之礼、长幼之伦、以及民间节庆、娱乐的文化意义，赋予这些传统礼俗一个新的文化生命，纳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

在简述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与内容特色后，作为当年的执行编辑，我非常高兴这套丛书在李安小姐的主持之下，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版，期待书中的观点能够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有所助益。

2011年11月

序 言

许树安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章制度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且富含其时代特征，因此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古代各种历史文献层出不穷，要想读懂这些文史典籍，也必须掌握古代典章制度。

官僚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表现在官僚机构设置的逐渐完备和分工不断细化合理、官员职能愈加专业化、官员考核奖惩日益严密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御史监察系统的设立是中国所特有的一大发明。早在西周某些职官就已经具有监督百官的职能了。至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已设有御史，他们是专门行使监察职能的官员。至秦汉时期则发展成自上而下的一套御史监察官僚体系，它们独立于一般行政官僚系统之外，基本职能是监督各级官员违法行奸之事，具有弹劾权力。此外，汉代以来又开始在行政机构中设置以讽谏朝政、匡正违失为其职能的谏官。因谏官的职能难以同御史截然分清，最终于宋代以后实现合流。

在西方，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检查制度、古罗马的公民大会是后来

欧洲监察制度的滥觞。古希腊的雅典，由公民（只限于成年男性自由民）选举出公民大会以及五百人组成的议事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平民在政治上的民主和监督作用。而古罗马的公民大会以及由大会选举产生的监察官（户籍官），也具有一定的监察职能，它们与元老院、执政官相互制约，以求得政治平衡。

此外，在中国众多的典章制度中，尤其以选拔人才、任用作官的科举制度最有特色，且具世界性影响，它们是古代国家机器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科举制度如此重要，它究竟产生在何时？许多人说它产生于隋朝。然而要想得到确切答案，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科举制度。我认为，科举制度较之它以前所有选拔人才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自愿报名”；或者说，它是一个以“自愿报名”为基本特征的考试制度。

隋唐两朝开始，它们并不都是实行了新的选拔人才的制度，而是照旧实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但也很快就废除了。原因很简单，旧制度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实行。地方势力掌握了一定的选举权，很容易助长地方豪门士族势力的滋长，对朝廷是不利的，所以朝廷就把它停止了。

不用九品中正制度了，于是隋文帝多次设科，令官员荐举人才。按规定在五品以上范围内，依据皇帝的旨意，按照十科（如孝悌有闻、才堪将略等）来举荐人才。这和两汉的察举是一样的，可见这不是什么新的制度。

有人引用史书的记载：“炀帝始建进士科。”（《通典·选举二》）认为必与科举制度有关，其实“进士”一词西周时就有了，指在进入国学读书的学生中选拔优秀人才，称为“进士”。隋炀帝为什么要设立进士科？唐朝的薛登在给武则天的上疏中说得一清二楚。薛登讲，隋文帝时，李谔向文帝进言说，三国时期，曹操、曹丕、曹植三位前辈喜好文辞创作，忽视治国的根本道理，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小技巧。以后世俗们争相效仿，而朝廷又以此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结果造成文风日益繁琐，只在写作技巧上下功夫，而政治形势却陷于混乱。隋文帝接受了李谔的意见，于是下令：从此禁止华而不实的文风。……隋炀帝

即位后，又改变以前的决定，设置进士科，鼓励提高写作技巧。于是，年轻书生们又都注重运用词藻、追求华丽，以此来相互标榜。可见，隋炀帝设立进士科，只是为了扭转文风而已，并非是建立什么新的选举制度。

还有人说：分科考试就是科举制度。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度既分科，也考试，但那不是科举制度。真正体现科举制度的出现应该是有了“自愿报名”，这是唐朝以前任何朝代所没有的。因此“自愿报名”是科举制度和以往任何选举制度的一个根本区别，体现了一个新制度的基本特征。

从唐朝科举的考生来源看，有两种：一种叫生徒，就是国家学校的学生。当时的国子监、崇文馆、弘文馆，都是朝廷设立的学校，地方州、县也有学馆。这些学校的学生在学校里经考试通过，学校认为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就保送他们去报考朝廷主持的科举考试，所以这批考生是从学校里来的。第二种叫做乡贡，就是各地的平民子弟，他们可以在当地官府报名要求参加科举考试。

乡贡在地方官府报名后，还要经过县和府的考试，把水平太差的考生淘汰下去。经地方官府考试通过的人，才有资格到长安参加尚书省礼部举行的正式的科举考试。可见，科举考试制度在唐朝确立的。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自唐朝至清朝末年，长达一千三百余年。它以其最大的开放性面向社会，选拔出大量优秀人才。公元十世纪开始，中国周边的朝鲜、越南等相继引进了科举考试制度。其中朝鲜半岛更是不间断地将这一制度延续了九百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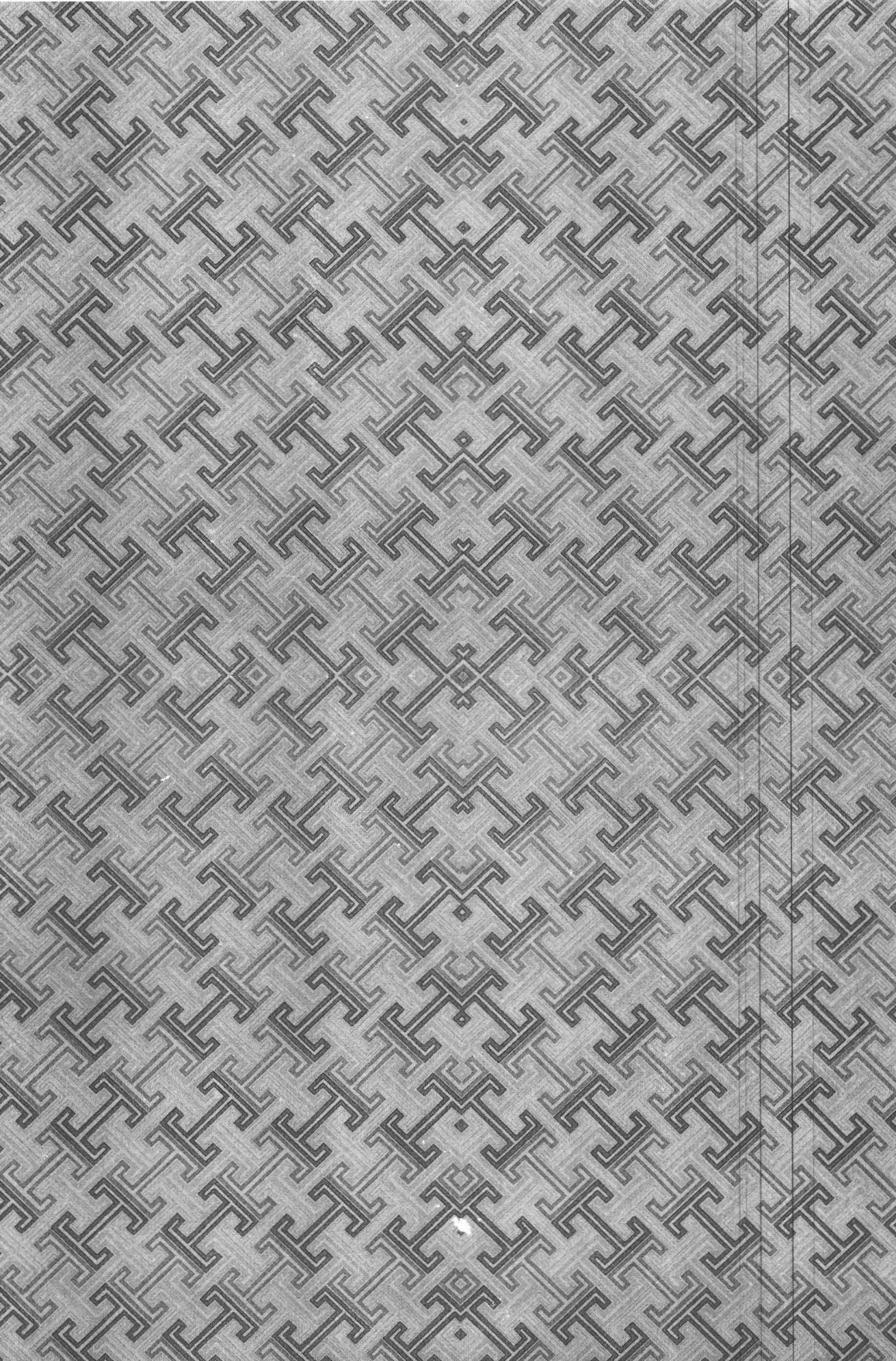
在欧洲，古希腊、古罗马不存在专门的考选人才做官的制度。进入中世纪后，权力被教会和贵族所垄断。所以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时，很快就对中国的科举考试着迷不已。1793年，英国第一个来华使团团长玛噶尔尼在他的中国考察报告中，也十分看重中国的科举考试。他们都高度评价这种不论出身、不计财产，只凭个人学识进行的平等考试。于是这种公平竞争政府公职的做法，很快便被英法等国所引入，相继建立起文官考试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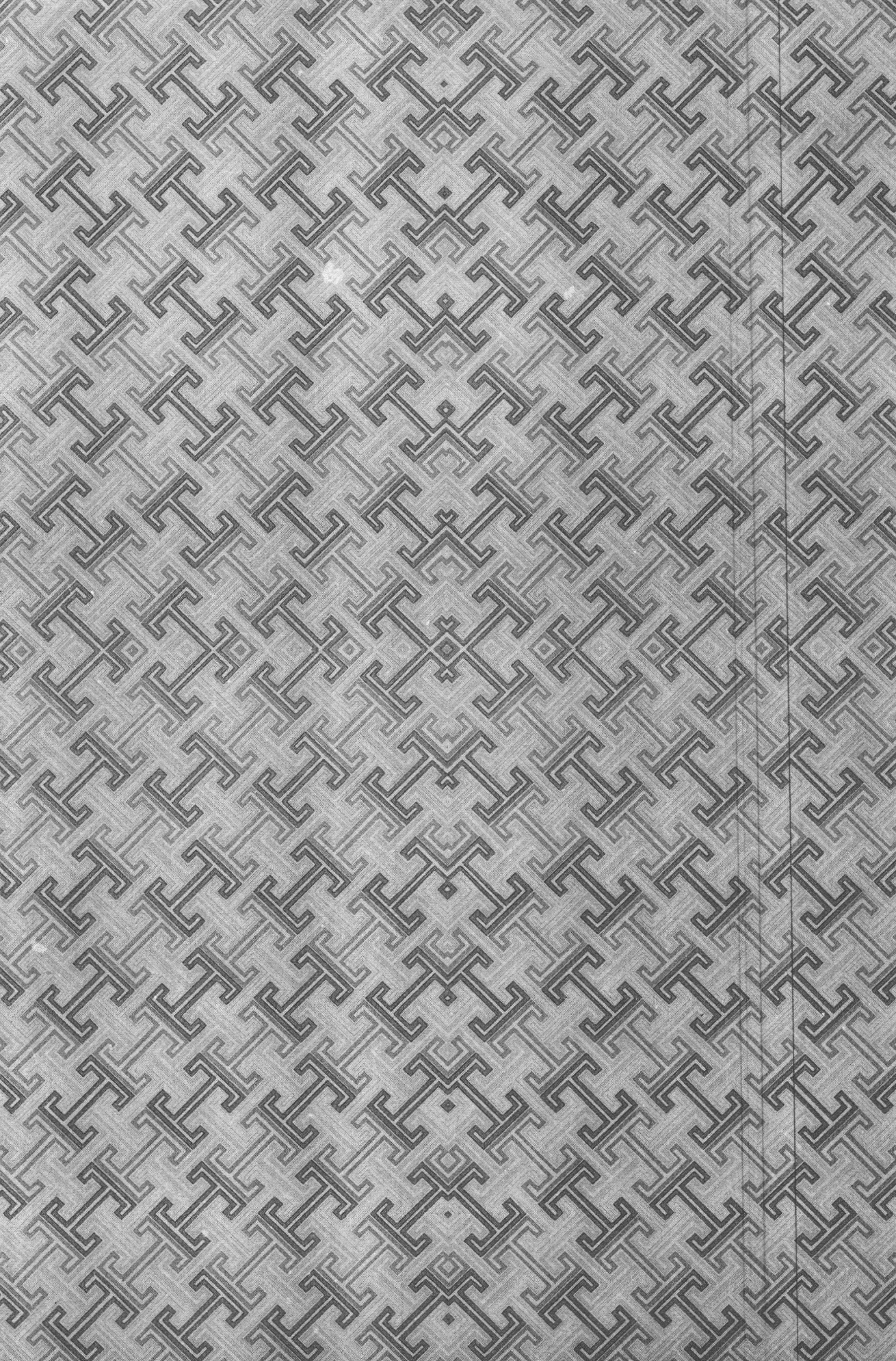
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忽视典章制度。欣喜郑钦仁等先生为“文化中国”丛书撰写了《中国古代制度略论》。作者正是突出了最重要的古代官僚制度和选举制度两个方面，不仅所举史料翔实，而且文字深入浅出，十分有助于向广大读者宣扬中华文化之精粹，因此应该向他们致以衷心谢意！

2011 年10 月

目 录

i	总 序
	林载爵
vi	序 言
	许树安
4	导 言
	郑钦仁
12	帝国遗规两千年——古代政治制度的特色
	郑钦仁
22	奉天承运——皇帝制度
	邢义田
54	王者佐·社稷器——宰相制度
	林丽月
84	柏台风宪匡政风——监察制度
	葛绍欧
112	乡举里选——两汉的选举制度
	郑钦仁
128	九品官人法——六朝的选举制度
	郑钦仁
156	科举——隋唐至明清的考试制度
	李弘祺
188	考论得失·惩恶劝善——史官制度
	张荣芳
222	帝国基础——乡官与乡绅
	王霜媚
248	君储圣王·以道正格——历代的君主教育
	朱 鸿
280	托古改制——历代政治改革的理想
	李孝悌
308	作者介绍





导 言

郑钦仁

中国的历史绵延流长，经由当代考古发掘的努力，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之半坡类型的文化，它的聚落结构、社会形态、氏族长的权力之种种早已为史家娓娓称颂。人类是政治的动物，政治的运作在这样原始的时代已经显著可观，可见其起源当更早于这一时期。

另一方面，从“记载的历史”来看，传说的古史最早从黄帝说起，把一切伟大的创造也都归之黄帝。按照推测的年代，黄帝约当公元前两千四百多年；比照考古上的发掘，只不过与半坡遗址一样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阶段。因此，黄帝或许只是新石器时代华北一支比较强大部族的首长，他的事迹突出，成为传说中的英雄。

上古时代，部族林立，相传黄帝时有万国，由此不难想象这时候的“国”就是部族性质的组织。

到了周初，相传有一千多个国家，国的数字减少了。商、周时期的国是“邑制国家”的形态，商、周本身只是这些国家群的“共主”而已。

国的发展与华北的生态环境有相当的关系。华北属于照叶树林的开阔地区，较少天然的屏障，开阔地的个别地区又各有不同的物产，每个单元因生活需要而经常发生力与力的关系，造成统合的现象，所以强有力的国家渐在华北出现。相反的，在江淮以南的地区，由于气温高、丛林沼泽多，天然造成区域间的隔阻，用原始的工具开辟较难，但优厚的自然条件也使人类谋生较易，与华北开阔地的物质需求与生存竞争形成显著的对照。因此中国最早的王朝，即夏、商、周“三代”的国家组织，也就先在华北出现。

周初一千多个国家，到三百年后的春秋初年仅余七十余国，其中在华北政治舞台上较活跃、显著的有十二，这就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列诸国。战国末期则剩下史上所说的“战国七雄”。各国竞相走向武力争胜的结果，是终于为秦吞并，形成统一的王朝帝国。秦帝国就是战国时代完成的专制王国的扩大和整编。战国时代的国家形态，已经从“邑制国家”发展成“领土国家”，或称广地域国家了。本书考察的对象实际上是以这种形态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为主。